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
系列丛书



屏东天主教研究： 天主教在菲律宾的殖民扩张 与文化调适（1565-1898）

施雪琴 著



东南亚与华侨华人研究系列之十七

菲律宾天主教研究： 天主教在菲律宾的殖民扩张 与文化调适（1565–1898）

施雪琴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菲律宾天主教研究:天主教在菲律宾的殖民扩张与文化调适:
1565~1898/施雪琴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 6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系列丛书)
ISBN 978-7-5615-2784-9

I. 菲… II. 施… III. 罗马公教-基督教史-菲律宾-1565~1898
IV. B979. 3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87253 号

责任编辑:薛鹏志

封面设计:文 心
妹 婕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大学 邮编:361005)

<http://www.xmupress.com>

xmup @ public. xm. fj. cn

三明地质印刷厂印刷

(地址:三明市富兴路 15 号 邮编:365001)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7 插页:2

字数:200 千字 印数:1~1 000 册

定价:1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系列丛书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庄国土

副主编 王 勤 聂德宁(常务)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勤 庄国土 沈红芳 吴崇伯

陈福郎 林 梅 侯真平 聂德宁

蒋细定 廖大珂

内 容 提 要

从辅助西班牙殖民扩张与维护西班牙殖民统治的工具,到菲律宾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天主教在菲律宾的传播、适应、调和与变化是本书研究的主要内容。笔者试图通过对菲律宾天主教化与天主教菲律宾化的考察与分析,来探索特殊历史背景下宗教文化传播的性质、方式与特点,探讨近代天主教海外传播中的政治因素与文化因素,说明天主教成为菲律宾大多数民众信仰的历史根源与文化根源。菲律宾的天主教化是近代欧洲海外扩张与天主教东传运动的结果与产物。一方面,西班牙的殖民扩张主义在推动天主教的海外传播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天主教的普世主义精神与文化性质,也促使它在菲律宾的传播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文化传播本身的特点与规律,适应菲律宾的社会状况,并与菲律宾传统宗教习俗和民间文化相互调和,并推动了菲律宾民俗天主教的形成。可以说,天主教能成为今天菲律宾大众的信仰,天主教的文化适应与宗教调和是一个重要根源。所以,笔者在全面考察近代天主教东传运动背景与性质的前提下,着重从宗教文化角度考察和分析天主教在菲律宾广泛传播与渗透的社会文化因素,希望有助于全面、深刻地认识西班牙时期天主教在菲律宾传播的双重性质与菲律宾天主教化的多样因素。随着菲律宾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反对西班牙教会的专制统治成为菲律宾革命爆发的导火线。19世纪末,在菲律宾民族革命的炮火声中,西班牙的殖民统治顷刻瓦解。在菲律

宾共和国的政治宣言中，“政教分离”成为一条重要的政治原则得到正式确立与广泛承认，标志着在现代民族主义国家中，教会从法律上丧失了它参与国家政治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在世俗民族主义高涨的同时，菲律宾宗教民族主义也在继续飙扬。“菲律宾独立教会”的诞生不仅是“教会菲化”运动的继续，更具有深刻的政治与神学意义。一方面，“菲律宾独立教会”运动是菲律宾民族主义在宗教上的诉求，另一方面，它是菲律宾天主教内部的一次“宗教革命”，是菲律宾本土教会挑战罗马教廷在菲律宾的等级统治与教皇专制的一次实践。“菲律宾独立教会”运动是天主教在菲律宾本土化的最终表现，它所包含的现代性与文化认同是宗教现代化的必然归宿。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选题的意义	(1)
第二节 学术史的回顾	(10)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基本框架	(14)
第二章 欧洲殖民扩张与天主教东传运动	(20)
第一节 早期基督教探索东方的历程	(20)
第二节 早期欧洲对东南亚的殖民扩张与传教活动	(23)
第三章 前西班牙殖民时期的菲律宾社会	(43)
第一节 “巴朗盖”社会及其性质	(44)
第二节 菲律宾的原始宗教	(48)
第三节 伊斯兰教在菲律宾的传播	(58)
第四章 菲律宾天主教化的关键时期(1565—1650)	(67)
第一节 天主教会与西班牙殖民政策的修正	(68)
第二节 教区与教会学校的建立与发展	(78)
第三节 菲律宾天主教社会的初步形成	(87)
第四节 华侨的宗教皈依与同化	(95)
第五章 天主教在菲律宾:调适与变化	(105)
第一节 教会关于传教路线的分歧与争论	(105)
第二节 适应性传教路线在菲律宾的实践	(113)
第六章 天主教在菲律宾:阻碍与挑战	(138)
第一节 抗拒同化:北部山地民族的反抗	(139)
第二节 反殖民统治与信仰回归:农民起义的诉求	(144)
第三节 文明冲突抑或殖民扩张:摩洛战争	(156)

第七章 天主教本土化：教会菲律宾化进程	(169)
第一节 菲律宾传教士的成长与发展	(169)
第二节 “教区菲化”运动及其意义	(181)
第三节 近代反教会运动的高涨	(186)
第四节 菲律宾独立教会的诞生	(194)
结语	(201)
参考文献	(207)
后记	(217)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选题的意义

伴随着近代欧洲殖民主义扩张的基督教东传运动早已成为亚洲殖民地国家历史与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近代欧洲殖民主义扩张和殖民统治的研究多以政治及经济分析为主要课题,偏重于殖民(帝国)主义的军事扩张、政治奴役和经济掠夺,而对殖民主义的文化方面却缺乏应有的关注。与之相应的是,受殖民国家的去殖民化研究也多以政治经济独立为主要课题,对文化领域的去殖民化同样缺乏应有的关注,这不能不说这是殖民主义与受殖民国家去殖民化运动研究的一个缺陷。

从宗教文化上看,菲律宾在东南亚地区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国家,虽然与其他东南亚国家(除泰国外)有着共同的长期被西方国家殖民统治的历史,但它独立后却保留了殖民宗主国西班牙的天主教信仰。天主教会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组织,在菲律宾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无论是从欧洲殖民主义扩张的角度,还是从近代天主教的传播与演变的角度来看,菲律宾的天主教化都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作为早期西班牙殖民扩张的重要工具和维持西班牙在菲律宾长期殖民统治主要支柱的天主教为何能广泛、深入地渗透到菲律宾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产生深远的影响,以至于在后殖

民时代的菲律宾仍占据重要地位,甚至今天的菲律宾政府,也尝试着从宗教文化纽带的角度来认识菲律宾—西班牙之间那段长达 300 多年的历史,并在 2002 年通过菲律宾共和国第 9187 号法案中(Republic Act. No. 9187),把每年的六月三十日定为“菲律宾—西班牙友谊日”(Philippine-Spanish Friendship Day)。^① 面对这些问题,如果只是单纯地从政治角度出发,把地理大发现以来伴随着欧洲海外殖民扩张的天主教东传运动简单地指控为“文化侵略”,把传教活动笼统定性为“西方殖民者配合其军事、政治、经济侵略的先锋与工具”,把近代东西方的文化关系简单概括为“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未免偏激与狭隘。菲律宾的天主教化是西班牙海外殖民扩张的结果,同时也是近代基督教海外传播的产物。因此,全面理解菲律宾的天主教化,不仅要从政治上分析、考察近代欧洲(西班牙)的殖民扩张背景与殖民政策,而且还应从近代东西方文化关系入手,考察与分析近代基督教海外传播的背景、性质、内容与方式,以及基督教在传播过程中的适应与变化。从根本上看,伴随着近代欧洲海外殖民扩张的基督教传教运动是一场复杂的宗教文化传播运动,其复杂性表现在:传教运动深刻而多样的时代背景、传教士活动的广泛性、其社会关系的多重性以及影响的多面性方面上。简而言之,它既是以基督教为核心的欧洲文化传播运动,同时又与欧洲殖民扩张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殖民扩张与宗教文化传播的双重性。这在政教一体的西班牙帝国的海外扩张中,表现尤为显著。

一、辅助殖民扩张的天主教

在新航路开辟后的东西方关系研究中,基督教的海外传播一直

^① 该节日是为纪念菲律宾共和国第一任总统阿奎纳多(Emilio Aquinaldo)1899 年 6 月 30 日颁布的一条法令。该法令下令免除被围困在今奥罗拉省(Aurora)巴莱尔镇教堂长达一年多的数十名西班牙士兵的死刑,并保证他们投降后,安全离开菲律宾,返回西班牙。

是该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其中学术界关注颇多的一个课题就是关于传教士在欧洲海外殖民扩张中所扮演的角色、所起的作用以及他们在殖民地的活动。总的说来,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中国学者鲜于从文化传播与文化交流的角度、而多从反殖民主义的政治角度出发,把传教士定性为“西方殖民者配合其军事、政治、经济侵略的先锋与工具”;把传教士在殖民地的活动(主要是文化教育活动)指控为“文化侵略”或“文化帝国主义”,即传教士通过传教活动为西方的军事、政治、经济侵略服务的行为。

毋庸置疑,“文化侵略”说或“文化帝国主义”说从政治角度对殖民扩张背景下传教士在殖民地活动的种种指控有其合理性,因为近代基督教的海外传播与欧洲殖民主义的扩张的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传教士在殖民地的活动也的确产生了有利于欧洲殖民统治的客观效果。这在菲律宾表现尤为显著,传教士在西班牙殖民扩张与维护殖民统治中所起的作用甚至超过了殖民军队,难怪乎有历史学家认为“十字架的作用比军刀大”,“传教士是真正的征服者”。从世界近代史来看,可以说自 16 世纪地理大发现以来,基督教的海外传播与近代西方殖民主义的海外扩张是紧密相连的,在西方殖民主义的海外扩张活动中,传教士常常与殖民者同船而来、携手并进,“十字架”与“剑”成为近代欧洲海外扩张的左臂右膀。正如方济各派的编年史家特瑞达德(Paulo da Trindade)在其《东方的精神征服》(1638 年)一书中写到:“在征服东方的过程中,世俗权力与教会力量紧密结合,缺一不可,因为世俗权力只能借助传播福音而获得力量,进行征服殖民地,而福音的传播只能依靠世俗权力的保护。”^①基督教与欧洲世俗政权殖民扩张之间的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与基督教的内在本质以及当时欧洲特殊的历史背景密不可分。

首先,从宗教本身来看,宗教与政治有着内在、不可分割的联系。

^① C. R. Boxer, *The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1415—1825*, New York, 1969, p. 228.

基督教尤其如此。基督教诞生初期，虽然遭到罗马皇帝的迫害，但自公元4世纪米兰敕令颁布后，基督教便成为罗马帝国的合法宗教，并很快上升为罗马帝国的国教，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与罗马帝国扩张和统治的有效工具。在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一统天下，教权极度膨胀，甚至发展为高于世俗君权的神权统治体制，基督教成为欧洲封建社会的主要支柱，罗马教廷成为欧洲封建神权统治的中心，教皇成为欧洲政治事务的最高仲裁，教会信条成为欧洲社会的政治信条。这种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不可避免地使近代欧洲的殖民主义扩张带有基督教的烙印与使命。

其次，地理大发现时代的价值观，即以征服“落后”地区和“文明”扩张为核心的“帝国主义精神”，把天主教与欧洲世俗政权的扩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欧洲中世纪时期，由于基督教一统天下，上帝在世界和历史中具有绝对优先性的观念根深蒂固，几乎所有的传教士都相信，基督教是文明的象征，白人肩负改造其他劣等民族的使命，而其他民族的宗教与文化则是“落后”与“野蛮”的，“先进”改造“落后”，“文明”征服“野蛮”，其中似乎蕴含着天然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这种基于基督教的“文明论”与“使命观”为欧洲的海外殖民扩张披上了神圣的外衣。此外，基督教从诞生之日起，就浸透了普世主义、改变异端信仰和好战精神。而16世纪欧洲基督教却遭遇来自多方面的冲击与挑战，如穆斯林的长期包围，宗教改革带来的分裂，教会的腐化及其声誉的日益衰败，以及基督教亟待复兴的使命都迫使它实行改革并向外扩张，以抗击来自穆斯林的进攻，弥补因宗教改革在欧洲丧失的大块地盘以及实现建立纯洁基督教“乌托邦”的理想。而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也为欧洲基督教带来释放内在冲动的途径与复兴的希望。

第三，中世纪欧洲与伊斯兰世界为争夺圣城耶路撒冷的长期斗争培育产生的“十字军”精神，即世俗政权与基督教会并肩战斗，政治吞并和信仰改变紧密相连，对新航路开辟后的欧洲海外扩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16世纪欧洲海外殖民扩张先锋——西班牙

和葡萄牙的海外扩张活动中表现得尤为显著。历史上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王国均是在伊斯兰教对伊比利亚半岛的征服与基督教的再征服过程中形成的天主教王国，长达七个世纪的宗教冲突使西班牙与葡萄牙成为基督教世界反对伊斯兰教的急先锋。“对欧洲其他民族而言，伊斯兰教是一个遥远的威胁，但在伊比利亚人眼里，则是一个传统的、永远存在的敌人。”^①新航路开辟后，西、葡的海外殖民扩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历史上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斗争的延续，这其中包含有深刻的宗教因素。并且由于两国王室与罗马教廷长期的特殊关系而享有的“保教权”，使其海外殖民活动与传教事业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伊比利亚半岛国家的“保教权”最早可以追溯到 15 世纪初。葡萄牙南部从撒拉森人(Saracens)手中“光复”，北非贸易重镇塞勿塔的占领以及航海王子亨利时期对西非沿岸的探索，这些行动都得到罗马教皇的支持，并颁布了几道教皇诏书授予葡萄牙国王享有在新发现的殖民地建立教会和派遣神职人员的特权。西班牙王国从穆斯林手中“光复”失地，同样也促使了几道教皇诏书的颁布，其中最著名的是 1485 年的教皇诏书，它授予西班牙国王享有向罗马教廷的直辖区派遣神职人员的权利。后来随着西班牙海外殖民扩张活动的加剧，王室享有的“保教权”也逐渐膨胀并达到高峰。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由于罗马教廷手中没有传教士和足够的经费支持海外传教活动，1493 年，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颁布敕令，命令西班牙国王费尔南多和王后伊沙贝拉向当地土著居民传播福音，并使他们皈依天主教。后来又在 1508 年的“教皇帝国”(Universalis ecclesiae regimini)诏书中规定了西班牙国王“保教权”的权利与义务，即西班牙王室从经济上支持海外殖民地的教会，作为回报，罗马教皇授予其向海外殖民地派遣传教士，任命主教和其他圣职人员的

^① 斯塔夫阿里诺斯：《全球通史：1500 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24 页。

特权。^①

天主教推动欧洲海外殖民扩张与维护殖民统治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以菲律宾为例,由于传教士的帮助,西班牙殖民军队几乎兵不血刃就占领了吕宋岛与米沙扬群岛。之后,天主教充分发挥其社会统治与控制功能,维护了西班牙在菲律宾长达三个多世纪的殖民统治。处于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的菲律宾,天主教会是宗主国天主教会的延伸,它不仅手握着神圣不可侵犯的神权,而且享有广泛的政治、司法、文化、教育、财政、经济等多方面的权利,成为殖民统治机构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天主教在征服菲律宾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充分体现了其充当殖民工具与先锋的性质。

二、传播宗教文化的天主教

权力的扩张必然带来文化的扩张,一个文明权力的扩张总是伴随着文化的繁荣。的确,近代欧洲殖民主义的海外扩张,一方面是军事、经济、政治势力的扩张,另一方面是以宗教为核心的文化传播。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探讨近代以来的东西方关系,不仅要注重军事侵略、政治统治与经济扩张领域的研究,同时也要重视文化传播与交流领域的考察与思考。在文化传播方面,只注意到文化传播与权力扩张的内在联系,或简单地用“文化侵略”或“文化帝国主义”来概括传教士的活动和近代东西方文化关系的全部内容却有失偏颇。首先,“文化侵略”论只片面地强调了传教士在殖民地文化教育活动的政治用心和政治后果,而忽视了其在文

^① 在后来的实践中,“保教权”逐渐演变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传统,一种普遍的法律,即“王室许可证”制度(*pase regio*),以至于后来罗马教皇向西班牙海外殖民地派遣神职人员或发布命令都要征得西班牙王室的同意,如果没有西班牙国王的同意,任何人不得进入美洲殖民地,没有西班牙高等法院的许可,西班牙国王的这种权力不能改变。后来,罗马教廷意识到“保教权”的弊端,为打破西、葡两国对传教权的垄断,将传教团置于教廷的管辖之下,从而脱离天主教国家和传教团的控制,教廷于 1622 年成立了直接受教廷管辖的传信部。

化教育方面的其他影响。其次,从文化角度而言,文化现象与政治和经济现象相比有其特殊性,借用主要适用于民族国家之间政治和经济领域的“侵略”一词概括文化现象,并不完全适当。^①任何一种成熟的世界性宗教,是以信仰形式表现出来的文化。文化学家克里斯托弗·道森认为,宗教是理解文化的关键,在文化的形成中起着重要的作用。^②西方文化被称为“基督教文化”,由此可以看出宗教与文化之间的紧密联系。从宗教本身来看,宗教与构成世界文明的三个层面——物质生产、组织制度和思想观念互相联系,相互影响,甚至互相重叠,并在第三个层面即思想观念中还往往居于深层和核心地位。基督教作为欧洲社会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是欧洲社会精神系统中的一个要素,而且也是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是欧洲社会历史中的一种综合的文化体。并且由于文艺复兴思想的熏陶,许多早期到东方的天主教传教士都具有深刻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他们既继承了中世纪的宗教精神与宗教热情,同时也兼具非凡的科学知识与能力。他们在传播天主教过程中除了借助欧洲的政治经济权力向其他社会推进其价值观、实践和体制外,而且还遵循宗教文化传播所特有的规律、方法和途径,天主教在菲律宾的广泛传播就充分体现了天主教在扩张过程中包含的非政治因素,即宗教文化传播的性质与特点。

首先,一般而言,在宗教传播过程中,处于宗教初级发展形态的原始宗教容易被高级形态的一神教所征服。基督教是一种世界性宗教,它具有不同于一般民族——国家宗教的内在特殊性质,即超民族性。第一,它信仰的对象是抽象的上帝,视之为全世界、全人类的神,

^① 王立新:《“文化侵略”与“文化帝国主义”:美国传教士在华活动两种评价范式辨析》,《历史研究》,2002,(3),第98~109页。

^② 克里斯托弗·道森:《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这使它能够产生普遍的意义,从而超出民族的狭隘范围。其次,基督教信仰目的具有出世性。即它追求的根本目的不是任何民族的现实利益,而是以抽象的人的灵魂生活和来世生活为基础,具有超现实的指向和超越现实具体生活的目的,因而被其他民族接受。第三,和民族宗教相比,基督教的礼仪规范十分简易,教徒可以在任何时间、地点和条件下通过最简单的仪式如祈祷,无须供物,无须隆重礼仪,就可以乞求上帝的保佑,这是促使它成为各民族广泛接受的原因之一。正如恩格斯所说:“基督教没有造成隔绝的仪式,甚至没有古代世界的祭祀和巡礼,它这样否定一切民族宗教及其共有的仪式,毫无差别地对待一切民族,它本身就成了第一个可行的世界宗教。”^①而相比之下,在天主教传入之前,菲律宾中、北部各民族普遍信奉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和巫术,具有十分明显的局限性与狭隘性,自然无法抵御这种世界宗教的冲击。

其次,除了西班牙殖民政权做后盾外,天主教传播的方式、方法以及在传播过程中采取的调适主义,以及因此而带来的天主教在菲律宾的区域性变革——菲律宾民俗天主教的形成,均积极地推动了天主教在菲律宾的迅速传播。

自基督教人文主义者荷兰鹿特丹的伊拉斯谟引进“基督的适应”(accommodatio)这一概念,并为“适应”这种方法做了神学辩护后,欧洲传教士纷纷追随这种传教方法到海外传教。一方面,伊拉斯谟的“基督的哲学”论证了异教徒通过福音传播获得拯救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强调了传教要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采取变通的方法让“基督”去适应每一个人。^② 天主教在菲律宾传播过程中,在对待菲律宾本土文化方面,与传教士早期在墨西哥对当地宗教文化实行斩草除根

^① 恩格斯:《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34~335页。

^② 陈海珠:《基督的哲学:伊拉斯谟的宗教思想述评》,《世界历史》,1999,(6),第76~84页。

的方法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传教士适当地保留了菲律宾民族原始宗教与文化中的某些观念和内容，并加以改造，以利于天主教在菲律宾的传播。其一，针对菲律宾多民族、多语言的情况，保留和改造了菲律宾各民族的语言，把天主教的教理问答与天主教教义翻译成各民族的语言加以出版，并积极地运用方言传教，极大地推动了天主教在菲律宾的迅速传播。其二，天主教在菲律宾传播过程中并没有对菲律宾原始宗教信仰连根拔除，反而将菲律宾原始宗教文化中的某些元素与罗马天主教中的一些元素融合在一起，促使天主教发生了区域性的变革，形成了在菲律宾农村广为流行的民俗天主教。这种宗教上的调适主义(syncretism)是天主教在菲律宾广泛传播的重要原因。

在 300 多年的殖民统治中，西班牙殖民统治遭遇了来自多方面的挑战，如穆斯林的袭击，华侨与菲律宾人民的起义以及来自其他欧洲殖民国家如葡萄牙、荷兰和英国海军的侵扰。但是这些威胁都没有推翻西班牙在菲律宾的殖民统治。由于海路遥遥，驻扎在菲岛的西班牙人不过数千人，^①而帮助殖民政府化解历次危机的主要还是天主教化的菲律宾人。传教士成功地对菲律宾人灌输了一套新的伦理与价值观念，并在心理上有效地控制了土著居民，使其心甘情愿地为殖民政府和天主教会效力，维护西班牙天主教会在菲律宾的统治。但随着 19 世纪菲律宾民族意识的觉醒，菲律宾教会开始发生分裂，菲律宾籍传教士开始反对西班牙教团的种族歧视与专权，要求宗教上的平等与权利，要求“教区菲化”，由菲律宾传教士管理教区。随着

^① 有关西班牙士兵在菲律宾的人数，以下数据可作为一个参考。1600 年，共 470 人；1603 年，驻马尼拉的西班牙士兵不超过 700 名；1636 年，有 1762 名西班牙士兵和 140 名土著。1828—1896 年间，驻菲律宾的西班牙官兵在 1000~3000 人左右。1896 年，西班牙军队的人数达到 17659 人，其中只有 3005 人是西班牙人，其他的基本上是土著和混血儿。参见 John R. M. Tarlor, *The Philippine Insurrection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Pasay City, 1971, p. 19.